

周襄王居汜地望考辨

姚豪兵

提 要：春秋时期有周襄王避叔带之难，出居郑地汜一事，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汜的地望，学术界有河南襄城说、荥阳京襄城说、荥阳周古寺说3种不同的观点。根据对《左传》《国语》等基本文献所反映的汜地理形势的分析，周襄王所居之汜应在今荥阳市周古寺一带。

关键词：周襄王 沔 襄城 周古寺

一 有关周襄王居汜地望的三种观点

周襄王十六年（前636），王子带与王后隗氏私通，周襄王废隗氏，叔带与隗氏联合狄人攻打周襄王，周师战败，周襄王出奔郑国，居于汜地。故《春秋》曰：“冬，天王出居于郑。”^①《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秋，王出适郑，处于汜。冬，王使来告难，曰：‘鄙在郑地汜’。”^②《国语·晋语四》曰：“文公元年，冬，襄王避昭叔之难，居于郑地汜。”^③汜地因周襄王所居，后世称之为襄城。

关于襄王所居汜的地望学术界主要有3种看法，影响较大的传统说法认为即今河南省襄城县。最早提出此看法的为魏晋时期的杜预、京相璠等人，《春秋左传正义》：“王出适郑，处于汜。杜预注：‘郑南汜也，在襄城县南。’”^④《水经·汝水注》：“汝水又东南经襄城县故城南……京相璠曰：‘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也。’”^⑤此后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李泰《括地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清穆彰阿等《嘉庆重修一统志》以及嘉靖、康熙、乾隆等时期的《襄城县志》也都因袭此说，直至当代，学者们也大多持此看法^⑥，几成定谳。另一种观点认为汜地在今荥阳市京襄城遗址。《荥阳市志·大事记》记载：“周襄王十六年，襄王庶弟叔带与襄王妃叔隗关系暧昧，引起宫廷之乱。襄王奔郑，求救于诸侯。及坎饮，郑文公迎往京城暂住。此后，京城亦称襄城、京襄城。”^⑦京城在今荥阳京襄城遗址，《荥阳市志》编写者认为京城亦称襄城，襄城得名于周襄王，为周襄王曾居之汜地。第三种看法认为汜在今荥阳市汜水河附近周古寺。《汉书·高帝纪》：“汉果数挑成皋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数日，大司马咎怒，渡兵汜水。”如淳曰：“汜音祀。《左传》曰‘鄙在郑地汜’。”^⑧《后汉书·郡国志》：“成皋，有汜水。”刘昭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411页。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26—428页。

③ 左丘明著，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0《晋语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73页。

④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15《僖公二十四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上册，第423页。

⑤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21《汝水》，中华书局，2007年，第501页。

⑥ 参见黄盛璋：《连云港楚墓出土襄城公競尹戈铭文考释及其历史地理问题》，《考古》1998年第3期；金祥祥：《清华简〈系年〉“沃之师”相关问题初探》，《简帛》2016年第2期。

⑦ 荥阳市志总编辑室编：《荥阳市志》卷1《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8页。

⑧ 《汉书》卷1《高帝纪第一》，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43页。

注：“《左传》曰周襄王处郑地汜。”^①如淳和刘昭都认为周襄王处郑地汜在汜水。乾隆《汜水县志·古迹》记载：“襄城，在邑城南三十五里，今周村也，相传为周襄王避子带之难适郑居此。”^②民国《汜水县志》古迹篇也有相似记载：“襄城，周襄王避子带之难居此，即周固寺。”^③古汜水县周固寺即今荥阳市周古寺。

二 周襄王居汜不当在荥阳京襄城遗址

首先，周襄王避难所居之地为汜，而不是京。今京襄城遗址为春秋郑国京城遗址，“京”见于《左传》《国语》等文献，与同时代的“汜”地为两个不同地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秋，王出适郑，处于汜。冬，郑伯与孔将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视官、具于汜，而后听其私政，礼也。”^④周襄王所居和郑文公省视官、具的地方很明确是汜地，而不是京。京和汜会不会是同地异名，从文献记载来看，也不存在这种情况。京地，《左传·隐公元年》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⑤《国语·楚语上》：“昔郑有京、栎……叔段以京患庄公。”^⑥这里《左传》《国语》明确称其为京，而不是汜。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对汉京县有如下注释：“颜注：‘师古曰：即郑共叔段所居也。’补注：‘先谦曰：春秋郑地，见《左·隐传》。有索氏，见《昭传》。𦈡公时城之，见《郑世家》。后入韩，申不害，县人，见《不害传》。楚汉时战地，见《高纪》。《续志》，后汉因。《一统志》，故城今荥阳县东南二十一里。’”^⑦查阅《汉书地理志汇释》所载这些书籍，此地均名京，未曾叫汜，也从未提及别名为汜。这就说明京和汜显然是两个地方，那么周襄王避难所居之汜自然不在京。

其次，《荥阳市志》的观点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传抄自《汜水县志》。新中国成立以前包括《荥阳县志》在内的文献均未说京城遗址为周襄王所居，例如乾隆《荥阳县志》记载：“京城：在县东南二十里，广袤八里，郑庄公封弟叔段于此，号京城大叔，秦属三川郡，遗址存。”^⑧在此并未提及周襄王，而且在县志其他各处也并未提到汜和周襄王。《大清一统志》也记载：“京县故城：在荥阳县东南，《左传》隐公元年，郑武姜为叔段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太叔。《史记》汉二年，楚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间。应劭曰：京，县名，属河南郡。《隋书·地理志》：后齐省京县入荥阳。《括地志》：京县在荥阳县东南二十一里，即郑之京邑。”^⑨这里也没有把京县故城和周襄王或汜联系起来，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荥阳市志》为什么会把周襄王和京襄城联系起来呢？比照《汜水县志》《荥阳县志》和《荥阳市志》，并结合行政区划的变迁我们可以略窥其中的端倪。

历史上，汜水或名成皋，或名汜水，大部分时期都是单独设县。1948年11月，汜水、广武两县并为成皋县，1954年6月，荥阳、成皋两县并为荥阳县，1958年上街区由荥阳县划出为郑州市辖区之一。从行政区划变迁可以看出，1948年以后，汜水县不复存在，并在1954年以后成为荥阳

^① 司马彪撰，刘昭注补：《后汉书》志第19《郡国一》，中华书局，1965年，第3390、3394页。

^② 乾隆《汜水县志》卷15《古迹》，乾隆九年（1744）刻本。

^③ 民国《汜水县志》卷1《地理·古迹》，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④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26、428页。

^⑤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1页。

^⑥ 徐元浩：《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497—498页。

^⑦ 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1页。

^⑧ 乾隆《荥阳县志》卷2《地理·古迹》，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

^⑨ 穆彰阿等编：《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87《开封府二》，第5页。

县（市）的一部分。乾隆《汜水县志·古迹》明确记载：“襄城，在邑城南三十五里，今周村也，相传为周襄王避子带之难适郑居此。”^① 民国《汜水县志》古迹篇也有相似记载：“襄城，周襄王避子带之难居此，即周固寺。”^② 而乾隆《荥阳县志》仅有京城，却并未提及周襄王。1996年版《荥阳市志》却把京城和周襄王联系起来，说京城为周襄王所居，而《汜水县志》中的周村，今荥阳市周古寺却不再被提及。由此可知《荥阳市志》在纂修时是把原《汜水县志》的内容移植了过来。因为古汜水县现在大部分地区已经归荥阳市所辖，把《汜水县志》中的内容纳入《荥阳市志》本无可，但《荥阳市志》把汜地换了位置，换到今荥阳市京襄城遗址，就很不合理了。由上可知，荥阳市京城遗址并不是汜，也和周襄王没有关系。

三 周襄王居汜之地望在今荥阳市周古寺

河南省襄城县说和荥阳襄城说虽然都有一定的文献依据，但通过对《左传》《国语》等原始文献以及汜地理形势和历史文化的分析可以证明荥阳市周古寺为周襄王曾居之汜。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汜地在黄河南岸。《国语》：“冬，襄王避昭叔之难，居于郑地汜。使来告难，亦使告于秦……公说，乃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以启东道。二年春，公以二军下，次于阳樊。右师取昭叔于温，杀之于隰城。左师迎王于郑。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郏。”^③ 此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在王屋山^④，今济源曲阳有阳樊遗址，温在今河南温县西南，黄河北岸。可以看出晋文公启东道后到阳樊便可分兵迎王，阳樊、温等都在黄河附近，其迎王的地方也应在距黄河不远处。《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秋，王出适郑，处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温。”^⑤ 《二十五年》：“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⑥ 河即是黄河，秦伯师于河上就可以纳王，那么王所处之汜应在黄河附近。又因汜地在郑国，而郑国在黄河以南，故而，汜地应在黄河南岸，且距黄河不远。荥阳市周古寺在汜水附近，距黄河不远，正符合史籍记载，而今许昌市襄城县距黄河有数百里，与黄河之间隔有颍水以及嵩箕山地，晋师不可能在数百里之外黄河北的阳樊即分兵迎王，秦伯也不可能在河上到襄城汜地纳王。由此，汜地应在荥阳市周古寺。

其次，从晋师迎王时间和行军距离来分析，汜地在荥阳市周古寺一带。《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侯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⑦ 从时间上看，三月甲辰为三月十九日，晋军到达阳樊，夏四月丁巳为四月三日，周襄王已经入于王城，王城在今河南洛阳，这期间共有十四天，这十四天晋师迎王的路线是从阳樊到汜，然后由汜到王城。《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注曰：“一宿为舍者，古代师行一日三十里，三十里为一舍，故一宿亦为舍。”^⑧ 则春秋行军一日三十里，《穀梁传》曰：“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⑨ 《孔子家语》：

^① 乾隆《汜水县志》卷15《古迹》，乾隆九年（1744）刻本。

^② 民国《汜水县志》卷1《地理·古迹》，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③ 左丘明著，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0《晋语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73页。

^④ 参见史念海：《史念海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3页。

^⑤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26页。

^⑥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31页。

^⑦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32页。

^⑧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61页。

^⑨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4页。

“周制：三百步为里，千步而井。”^①《大戴礼记·主言篇》：“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②这些典籍都说300步为1里，至于一步多长却未详细记载，据杨生民研究，周秦汉1里约合今415.8米，为今市里的83.16%。^③那么晋师一日行30里，约为12474米，14天不休息可行军174636米，约为今349里。阳樊遗址到今襄城县直线距离约300里，步行线路约380里，因此，晋师不可能在14天内到襄城汜地然后再把周襄王送回王城。晋师从阳樊出发，到荥阳市周古寺，再迎周襄王回王城，一共约为350里，与上述晋师14天行军距离349里相差无几，正说明该地为周襄王所居之汜。

再次，周襄王所居之“襄城”在周古寺。河南省襄城县说的重要依据之一是襄城县因周襄王曾居之而名襄城。但于薇曾搜集并整理了晋南与鄂东豫西地区17组重名地名，其中就包括豫西的襄城县，并认为地名群组很可能与族群迁徙有关。^④于薇在系统总结后得出的结论是相当可信的，也就是说豫西地区襄城之名很可能来源于晋南地区的族群迁徙。荥阳市周古寺也有襄城，不仅见于《汜水县志》的记载，在唐人的文献中也有论述。唐颜师古《等慈寺碑》曾写道：“爰立此寺，俾号等慈，境实郑州，县称汜水……其地则遥瞻太室，夏后之所发祥，近眺襄城，轩辕于是访道。”^⑤太室即太室山，即今之嵩山，汜水县遥瞻太室，近眺襄城，则说明汜水县距襄城比太室山更近，襄城当在太室之北，古汜水县境内。近些年来，周古寺地区有数座唐墓及众多的随葬品被发掘出来^⑥，也可以说明此地的襄城在唐朝时还有许多人居住。《中州杂俎》也有文曰《汜水自有襄城》：“襄城去汜水南三十五里，今周村也，人传为周襄王避兵处，郑人筑之以纳王也，遗址略存。”^⑦直到清朝，周村还有襄城的遗迹存在，该处的襄城才是周襄王曾居之襄城。

最后，从周古寺的历史文化来看，此地为周襄王曾居之汜也是可以肯定的。据传这里是太昊伏羲、女娲发源之地。东汉章帝和年间，白马寺僧人在该处建一座佛寺，名为周古寺。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来到周古寺参访后，前往嵩山。^⑧传说虽不可尽信，但仍然可以透露一些历史信息。周古寺有一处龙山文化遗址，面积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采集有灰陶罐、瓮、鬲足、石斧、铲等。在相距不到500米的凤凰台村也有一处龙山时代遗址，面积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米，采集有釜、豆、罐等陶片，饰绳纹、附加堆纹或素面。^⑨这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个地区就已有先民居住，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伏羲氏、女娲氏族人。

西周时期，周古寺及周边地区是周人活动重要地区。乾隆《汜水县志》记载：“周妃冢，在小武村，岁久邱夷。万历初土人筑堰掘出宝鼎一（事），高三尺许，上镌六字，曰：‘有周文王’

^① 王肃注，[日]太宰纯增注，宋立林校点：《孔子家语》卷1《王言解第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5页。

^② 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卷1《主言》，中华书局，1983年，第5页。

^③ 参见杨生民：《中国里的长度演变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④ 参见于薇：《晋南与鄂东豫西地区两周时期的地名重名现象》，《古代文明》2018年第12卷。

^⑤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148《颜师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册，第659页。

^⑥ 参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荥阳市周古寺唐墓M2发掘简报》，《华夏文明》2016年第2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荥阳市周古寺唐墓M3发掘简报》，《华夏文明》2020年第12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荥阳市周古寺唐墓M6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6年第2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荥阳市周古寺唐墓M7发掘简报》，《华夏文明》2017年第4期。

^⑦ 汪介人：《中州杂俎》卷2《地理二》，民国10年（1921）安阳三怡堂铅印本，第6页。

^⑧ 参见王士端文，张胜杰图：《周古寺：慧可故里中原福地》，《郑州晚报》2015年3月26日，第D06版。

^⑨ 参见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第8页。

宫人。’外走银花甚细巧，内画后天八卦，见者知为上古重器。当时为洛中大家搏去。《博古图》记：‘文王鼎有三，二在陕西，一在河南，其此之谓欤。’”^① 小武村即今郑州市上街区武庄，在周古寺北不远处，西周时期还有周穆王在虎牢狩猎的传说，也在周古寺周边地区，说明西周时期这一带是周人活动的重要区域。春秋时期，周古寺为汜地，除周襄王曾居此地外，《左传·成公四年》还记载：“晋栾书将中军，荀首佐之，士燮佐上军，以救许伐郑。取汜、祭。”杨伯峻注曰：“汜地在今河南旧汜水县（县今已废，在今荥阳县之西北，巩县之东北）。祭在今郑州市北，或云在今中牟县。”^② 晋国所取的汜地在汜水县，即今周古寺地区。

秦汉以后，还有“步汜口之芳草，吊周襄之鄙馆”^③ 之说，意即汜水附近有周襄王曾居之处所，即位于汜水附近的今周古寺地区。东汉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这里成为佛教圣地。周古寺地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也就不难理解春秋时期周襄王避难为何要选择此地作为居处。

总之，荥阳市京襄城遗址以及河南省襄城县皆不为周襄王曾居之汜地，今荥阳市周古寺地区为周襄王曾居之汜。

余 论

由上述论证可知周襄王所居之汜不在河南省襄城县，而在荥阳市周古寺。那为何千百年来，河南省襄城县说盛行不衰，而荥阳市周古寺说却堙没无闻呢？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襄城县在春秋时期确为郑国汜邑。《左传》成公七年：“秋，楚子重伐郑，师于汜。”杜预注：“汜，郑地，在襄城县南。”^④ 襄公二十六年“冬十月，楚子伐郑……涉于汜而归。”杜预注：“于汜城下涉汝水南归。”^⑤ 沔城下有汝水，与今襄城县同。春秋时期，今襄城县位于郑、楚交界地区，为楚伐郑的必经之地，从楚伐郑屡经汜地可知今襄城县在春秋时期为郑国汜地。此汜地位于郑国南部，被称为南汜，与周襄王曾居之汜不同。二是魏晋时期襄城县地位的上升对学者产生了影响。襄城县自秦置县以来，一直没有间断，曹魏时期，曹操、曹丕父子经营许昌，襄城县也在重点开发之列，在此设置典农中郎将，发展农业生产。经过几十年发展，西晋于泰始二年（266）置襄城郡。与此相形见绌的是汜水襄城因未置郡县而逐渐被人遗忘。以致于魏晋学者多知颍川襄城而不知汜水襄城，又因襄城县也为春秋汜地，因此学者在为《左传》作注时便将“周襄王居郑地汜”一事系于此地。

由对“汜”地望的考辨可以看出行政区划的变迁对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影响。一千多年前由于颍川襄城县上升为襄城郡而受到学者关注，《左传》中周襄王所居之汜便被系于此地。千百年以后由于汜水县被荥阳市合并，其县志中关于周古寺和周襄王的记载又被新修的《荥阳市志》转移至京襄城遗址。反观古汜水县汜地由于长期以来皆不为郡县治所而不被人们重视，诞生于此地的文化也一再转移，政治地位对于一个地区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然而，古汜水县汜地仅仅是历史长河中此类现象的一个缩影，历史时期像它一样被遗忘的文化遗迹又何其多。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乾隆《汜水县志》卷15《古迹》，乾隆九年（1744）刻本。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819页。

^③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5《河水》，中华书局，2007年，第131页。

^④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卷26《成公七年》，第727页。

^⑤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卷37《襄公二十六年》，第1048页。